

# 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体系化防范

吴尚轩

(华东政法大学 国际法学院, 上海 200042)

**摘要:** 中资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日益遭遇严峻挑战, 相关挑战主要表现在国际秩序重塑与国内发展转型交织下的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等合规风险谱系。鉴于科技创新已成为大国博弈的重要场域, 体系化防范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涉及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 牵涉面广、要素众多, 难以毕其功于一役, 而需渐进式系统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既是商业合规的核心要素, 又与认知、话语、规范和实践等关键环节紧密相联, 可为推进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提供坚实支点。宜系统集成多梯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 充分发挥区域制度安排对话功能, 类型化归纳不同群体核心诉求, 全生命周期追踪东道国规范政策演进, 重视多媒体舆情归集和分析等, 从而倾斜性纾解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各种挑战。

**关键词:** 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 商业合规; 企业社会责任; 涉外法治; 媒体舆论

**中图分类号:** F276.44; F740.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76X(2024)03-0094-15

## 一、问题的提出

近年来, 中资科技企业在国际化经营中遭遇的合规风险不断上升。主体上, 合规风险事件涉及华为、腾讯、小米和字节跳动等企业<sup>[1-2]</sup>。地缘上, 风险发生地兼及“一带一路”诸国和传统西方世界<sup>[3]</sup>。谱系上, 合规风险种类涵盖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等类型。逻辑结构上, 内嵌价值认知、话语叙事、规范制定和策略实践的要素链条已初步显现。概言之, 中资科技企业积极进入西方世界, 在占据先发优势的全球治理框架中探索国际化经营, 并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国内发展转型交叠的大背景下卷入全球化博弈中来<sup>[4]</sup>。中资科技企业既是参与重塑国际秩序的重要行为体, 又是承载大国博弈的关键场域, 其国际化经营集中遭遇东道国法律规范、东道国行政管理、域外长臂管辖、区域地缘争端和中外风俗习惯差异等的合规挑战。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强化合规意识, 引导我国公民、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自觉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和风俗习惯, 运用法治和规则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上述论述揭示出在顶层设计上对合规工作的充分重视, 国际化经营语境下的合规应是涵盖遵守法律规则、符合行业标准和履行社会责任的系统概念<sup>[5]</sup> 39-41, 且与涉外法治理念密切相连<sup>[6]</sup>。国内学术界和实务界亦已对合规概念的边界初步达成共识, 即不应将合规讨论限缩于

收稿日期: 2023-11-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数据中国背景下公共数据技术标准的法治体系研究”(21&ZD20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统筹实施海洋强国与领土安全战略实施的国际法路径研究”(22JJD820010)

作者简介: 吴尚轩(1991-), 男, 江苏沛县人, 特聘副研究员, 博士, 主要从事企业合规和数据合规研究。E-mail: martinwushx@aliyun.com

刑事合规一隅<sup>[7]</sup>,而宜聚焦基于风险应对前置的全生命周期防范体系建构<sup>[8]</sup>。立足合规风险点前移的逻辑起点,探索融合涉外法治和合规人才培养、企业全生命周期合规体系建设、企业社会责任议题甄别与话语表达、东道国风俗习惯和地缘情况梳理等关键维度。相关研究问题可以概括为:如何基于科技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框架,搭建系统提升科技企业防范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能力。选择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作为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体系建构的基础支点,主要源自三方面的考虑:首先,以归属软法范畴的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倒逼企业整体合规水平提升,即以软法层级合规带动遵守硬法规范<sup>[9]</sup>。其次,以源自西方叙事逻辑的企业社会责任话语助力中国企业形象塑造,意在融贯西方话语推进议程协同。最后,以支撑中外共识凝聚的企业社会责任议题促进中国涉外法治体系建设,求解多元解纷和海外利益保障等议题上的最大公约数。

随着大国博弈下的国际秩序重塑与持续深入的国内发展转型深度交叠,切实保障中资科技企业妥善应对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既已成为涉外法治建设的题中之义,又为中国海外企业践行社会责任提供内生动力。本文将以对合规概念边界的溯本清源作为逻辑起点,厘清商业合规中法律规范、行业自律和企业社会责任等的应然区位和进路,以澄清关键概念为支点,搭建以认知—话语—规范—实践为逻辑顺序的分析框架。进而立足深入剖析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中的合规风险谱系,系统集成全生命周期合规体系建设、涉外法治人才梯队培养、东道国规范政策梳理和地缘现状评估等关键维度,久久为功,渐进式完善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防范体系。

## 二、企业社会责任支点的理论考察

企业社会责任的任何构成中资科技企业应对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关键支点,该问题要从理论溯源、概念边界和主体范畴等维度加以讨论。首先,中国海外投资是以企业为主要载体,近年来尤其是以中资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发展最快、遭遇的挑战最严峻<sup>[2]</sup>为主要特征,纾解此类行为体在海外遭遇的挑战,离不开与特定东道国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对话协商<sup>[10]</sup>,在传统西方世界与新兴经济体之间,企业社会责任将成为对话协商达成重要共识的基础。其次,特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应然边界理应由其行业性质、产业规模、商业模式和治理结构等要素共同决定<sup>[11]</sup>。探索国际化经营的中资科技企业通常规模较大、治理结构较完备、商业模式相对自治,其产品业务往往与数据、算法和算力等数字经济核心要素密切关联,乃至由于网络空间与物理空间的日益融合,而成为网络空间公共产品供给的重要补充<sup>[12]</sup>。头部科技企业普遍拥有更为复杂的系统的数字权力,乃至可能在特定区间、特定领域对作为公共产品排他供给者的政府提出挑战<sup>[13]</sup>。域外主体认知中资科技企业的运行逻辑,往往由于发展模式和价值取向等要素的影响而视其为更加复杂<sup>[14]</sup>。企业社会责任概念框架有助于对中资科技企业运行逻辑进行简化,并充分融合学理与实践,支撑中资科技企业在特定国家厘清其合规体系的实然边界。最后,围绕利益相关者展开的主体范畴梳理,契合围绕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多层次分析需求,从而能为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提供应对挑战的行动路径镜鉴。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面临多重挑战,既有西方社会公众对经济全球化积极作用的质疑,亦有传统西方世界头部科技企业的博弈,且包含特定东道国中央政府对本土数字经济产业的倾斜保护,兼有地方政府、工会组织和当地社区等行为体的情绪表达和策略投放。企业社会责任框架有助于类型化梳理、穿透式剖析、体系化匹配一系列关键利益相关者之间的诉求冲突,为设计防范国际化经营风险的体系化方案提供切入点。

概言之,企业社会责任能够为理论、概念和主体等关键要素提供支撑,用以应对安全、发展和民族情绪等要素融合影响下的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当然,运用企业社会责任支点的合理预期是助力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而非毕其功于一役地通盘解决上述多重难题。就这个意义而言,企业社会责任支点乃是面对国际经济秩序重构而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逻辑起点,为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提供了对话的共识基础和通用概念。

### （一）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溯源

企业社会责任议题起源于20世纪20年代，因20世纪70年代围绕企业本质和目的展开的论争而逐渐广为人知<sup>[15]</sup>。其核心观点在于商事企业不应只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在保证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同时关注企业股东以外的利益相关者的福祉，在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权益保障、员工关怀、竞争中立、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领域尽到适度责任，获益主体应涵盖员工、消费者、供应商、本地社区、债权人和东道国等类别<sup>[16]</sup> 19-20。提出伊始的企业社会责任主要以原则和倡议为主的软法形式存在，并遭受当时主流经济学的强烈质疑。时至今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在西方世界和新兴市场国家达成共识，并得到法律和政策背书，企业社会责任的约束力日益增强，乃至学术界宣称不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寸步难行<sup>[17]</sup>，印度等国甚至以立法形式设置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强制性规范<sup>[18]</sup>。由于追求环境、社会和治理效益协同日益成为主流趋势，经济嵌合于社会之中，从中脱嵌将造成严重后果<sup>[19]</sup>，社会责任逐渐成为商事企业运营的重要维度，用以作为守法合规的铰结点。

往返于历史与理论之间，进一步对企业社会责任溯本清源，现代企业的目的和功能范畴的演变深刻地影响着社会责任话语的表达。荷兰东印度公司和英国东印度公司代表现代公司制企业的缘起，上述两家东印度公司最早采用股份制形式，以商事主体的定位在海外实行政治管理、管理军事力量乃至建立货币金融体系，借此催化逐步形成现代国际秩序，并深刻影响沿线法域社会变迁的过程<sup>[20]</sup>。从这个意义上讲，现代国际秩序初起时的股份制公司不仅追求股东利益最大化，同时承担着公共产品供给的职能，其组织本质远超一般意义上的契约之联结，乃至超越了公法和私法主体的界限。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在鸦片战争前的近百年时间里，英国通过授权东印度公司来治理印度次大陆。19世纪早期，美国的现代股份制公司虽然不再牵涉军事和地方治理，但仍承担着交通设施修筑和公用事业服务等公共产品供给功能<sup>[21]</sup>。相较之下，19世纪中后期中国洋务运动中兴办的现代企业也客观上供给社会公共产品<sup>[22]</sup>。这固然与现代政府和商事主体的功能边界尚待厘定密切相关，现代商事公司介入社会和公共产品供给具有显著的历史惯性，实现股东利益最大化作为单一目的叙述的历史反而相对短暂。

中国企业广泛接受和践行社会责任始于21世纪之初，与国有企业改革推进、互联网企业兴起、中国融入国际经济秩序日益深入紧密相连<sup>[17]</sup>，企业社会责任由此对中国企业产生两重意涵：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对守法合规的内在追求促使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搭建自身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倒逼国有企业适应市场机制，促使民营企业提升合规底线<sup>[8]</sup>；另一方面，企业社会责任为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探索提供了行动指南和对话基础，助力中国企业在东道国的本土化经营探索。但同时应承认，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存在历史短暂、认知不足和体系欠缺等明显短板，亟待基于国内外实践的淬炼。

### （二）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边界

鉴于现代国际秩序是在西方世界主导下逐渐形成的，中国是参与现代国际秩序的后来者，在此之前，中国深受着力处理前现代世界秩序下朝贡体系与现代格局碰撞遗留的深刻影响<sup>[23]</sup>。对于后来者而言，参与国际经贸投资实践的框架和概念体系已经被西方世界主导，企业社会责任话语也概莫能外<sup>[24]</sup>。但总体而言，中国对企业应尽社会责任与西方世界存在许多共识，该概念体系高度契合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遭遇的现实困境，且中国与西方世界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运用上的差距较小，并对倒逼中国企业变革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因此，审慎恰当地运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体系有望构成中资科技企业应对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关键环节。

企业社会责任主要包括公共服务、环境保护、权益保障、员工关怀、竞争中立、国家安全和信息安全等领域，与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遭遇瓶颈、困境和指责的领域高度重合<sup>[25]</sup>。因此，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內化使用既有助于类型化梳理中国企业投资遭遇的具体领域，又能够循着东



道国、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和本地社区等质疑困境制造者的话语逻辑寻求协商和回应路径<sup>[24]</sup>。鉴于西方世界对于中国在环境保护、人权保障、国有企业地位和信息存储保护等现实议题上的责难,对企业社会责任话语的熟稔有助于争议焦点的定位及破解策略的制定。以中国在缅甸投资的密松水电站、莱比塘铜矿和中缅油气管道为例,相关项目进展受挫的重要诱因之一是中国企业实施环境评估未接入国际通行方案、缺乏社会责任概念下的事先环保行动实践和话语表达<sup>[26]</sup>。

相较于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深刻影响的国际经贸规则体系,中国与西方世界在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体系和实践上的差距相对较小。差距较小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从时间线上来看,20世纪末期的印度博帕尔惨案和耐克血汗工厂丑闻持续发酵,促使西方世界开始广泛评估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所在<sup>[16] 42-47</sup>,与中国企业广泛参与到社会责任实践的新世纪之初相隔不远;另一方面,跨国公司在华的长期经营和中国企业的海外探索促进了中国企业对社会责任概念体系的接受与移植<sup>[25]</sup>。因此,内化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体系更具有可操作性。同时,国有企业在中国企业海外实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国有企业对社会责任认知的现有运用存在瓶颈和局限,宜以社会责任概念体系的优化运用为切入点,倒逼国有企业观念和机制变革,进而真正提升应对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实践素能。

### (三) 企业社会责任的主体范畴

鉴于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多重挑战主要源自大国博弈、央地互动和企业竞争等层面,企业社会责任理论覆盖东道国、本地社区、非政府组织、劳工组织、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充分契合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分析框架,该理论所刻画的主题谱系能够系统衔接上述分析框架。当然,企业社会责任的理论框架用于分析和处理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需要调适,且面对特定东道国情境需进行本土化定位,该理论框架的调适和本土化定位将在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应对的体系化构想中详加讨论。

处在国际秩序之中的大国博弈构成了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重要来源。将“一带一路”合作伙伴的特定东道国设置为坐标轴原点,美国筹划的“印太经济框架”与中国“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碰撞交织成为关键场域<sup>[27]</sup>,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区域大国,伊朗、土耳其和新加坡等关键地缘国家,印尼、缅甸和越南等发展中国家各自在大国竞逐国际经济秩序重构主导权的进程中表达自身诉求、拓展本国安全边界。鉴于企业承载着绝大多数中国海外投资实践,在大国博弈下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风险的防范,就可简化为中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与传统西方世界、与一系列新兴经济体之间开展的经贸投资互动。由于在国际秩序层面缺乏最高权威,国际法和国际规则的运转因此得不到强制力的保障,上述规则在效力上与企业社会责任高度拟合,均是主要通过软法和利益相关者施压来实现规则设置<sup>[25]</sup>。缅甸政府差异化回应中国企业重大投资项目提供了典型例证。缅甸政府利用关键地缘禀赋撬动实现多元利益诉求的可能性,缅甸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缅甸投资项目采取差异化立场,一方面给中缅油气管道运转提供较充分保障,另一方面对密松水电站和莱比塘铜矿项目加以掣肘,以期达到换取西方世界制裁缓解,维系与中国经贸投资联系,引入日本、韩国和印度等区域大国促进外资结构多元化,推进本国政治民主化及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等多重目的<sup>[26]</sup>。对此,需要锚定中国跨国企业与东道国复杂互动的中心点,系统分析和处理众多利益相关者的核心利益诉求。

央地互动催生的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主要发生在国内秩序之中,相当比例的“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存在央地互动外观下的利益博弈。以印度、印尼和越南等法域为例,上述法域在雅尔塔体系催动的独立浪潮中获得主权的国家,其后各自又推进民主化进程<sup>[28]</sup>。然而,上述法域的现代国家外观与传统惯性间存在明显张力,多民族冲突、宗教势力干预和殖民历史影响等因素共同作用,使得地方政府、本地社区、非政府组织和媒体机构等主体追求的核心利益与中央政府存在明显抵牾<sup>[29]</sup>。以印度为例,其法律实践深受英美法系影响,政府架构设置赋予地方政府

极大的自主权，民族和宗教多样性促使政策和法律规范本身与其实施之间存在明显出入，使中国企业在印度投资遭遇巨大的不确定性。因此，企业社会责任对东道国、本地社区、非政府组织、劳工组织、员工、消费者、供应商和债权人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关注，为全面认识位于特定法域的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提供了方法论支撑。

### 三、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谱系剖析

跨国公司国际化经营与国际秩序演化深度纠缠，科技要素则起到催化剂作用。当代意义上的科技企业主要围绕互联网和信息技术提供软件或硬件产品服务，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已内嵌到其国际化经营实践之中。数据、算法和算力等要素协同作用，既使通用式人工智能持续迭代升级<sup>[30]</sup>，亦依托数字孪生等理念映射物理空间，也使数据跨境流动对传统边界和主权观念发起挑战<sup>[31]</sup>。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特定时代的商事企业经营和扩张探索往往深受彼时前沿性技术的影响，在通信、交通运输和关键矿物等领域的表现更为突出。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例，蒸汽机技术的日臻完善使得常态化远洋航行成为可能，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商业拓展为英国工业品生产提供销售市场，且其主导的硝石贸易又成为保障英国军事优势的关键支点。因此，最初的跨国公司与本国政府之间发生复杂互动，逐渐发展成融合国际投资贸易和公共产品供给功能的庞然大物，既在全球范围内搭建起以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为基础的国际治理秩序，催生早期全球化<sup>[20]</sup>；又促使集成有限责任、董事会结构下的授权管理、股份自由转让等关键特征的现代公司制度成为商事企业的主流范式<sup>[32]</sup>。

虽然以华为、小米、TikTok 和 WeChat 等为典型代表的中资科技企业海外历史相对短暂，但此类企业国际化经营探索所引发的关注与博弈却日益凸显。上述时序长度和博弈热度间的明显张力可以从以下三个维度进行解释：首先，历史经验表明，尖端科技格局变换可能导致全球治理权力的重新分配<sup>[33]</sup>。加之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价值体制存在一定程度的认知偏差<sup>[34]</sup>，通过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等手段限制中资科技企业发展，就成了其维系其优势地位的重要手段。其次，中资科技企业在 21 世纪以来整体发展迅猛，华为、中兴、腾讯、小米和字节跳动等本土企业可与高通、谷歌、亚马逊、Facebook 和苹果等西方科技巨头对标，且上述企业在 5G 通信、芯片制造、云计算和人工智能等重点领域有所突破，进而引发多个利益相关者对立法决策施加影响、对媒体舆论进行引导，以期对头部科技企业加以制衡<sup>[35]</sup>。最后，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遭遇全球化挑战，加之西方世界对全球化的积极作用多有质疑<sup>[36]</sup>，且西方世界社会极化消解社会共识，钳制中国企业成为应对社会极化的手段。因此，剖析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谱系，理应将其置于国际治理秩序重塑与中国发展转型交叠大背景下加以探讨。

概言之，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合规风险可归纳为国际秩序重塑与本土发展转型纠缠下的复杂谱系。议题上，涵盖青少年健康保护、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税务合规、经济制裁、环境保护、劳工权益和竞争中立等关键内容，突出表现为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博弈；主体上，牵涉东道国政府机构、立法机关、司法机关、科技企业、工会、地方团体和媒体等重要利益相关者，尤其以东道国政府机构、司法机关和媒体最为活跃。因此，本文尝试将法律规范钳制、政府规制束缚和媒体舆论博弈设为横向分析维度，将国家安全和发展的博弈设为纵向分析维度，以搭建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谱系分析框架。

#### （一）法律规范钳制

法律规范钳制主要用以刻画东道国政府机构和司法机关运用立法或司法手段，对相应商事组织和其雇员进行法律规制乃至刑事处罚。东道国政府机构往往将中资科技企业本土分支机构及其员工处以税务、金融等经济犯罪，或者制定针对性立法精准限制特定企业的本地化经营。随着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走向纵深，相应科技企业遭遇的法律规范钳制不仅源自传统西方世界，而

且来自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的规范挑战日益显现。华为、TikTok和小米等不仅在传统西方世界遭遇严厉合规钳制，而且在印度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也频遭规范性挑战。

自2021年末开始，印度政府频繁借助稽查税务名义冻结、扣押小米、vivo和OPPO等中资移动通信设备厂商资产，乃至以涉嫌经济犯罪为由对中资企业高管采取刑事处罚。2022年4月，印度政府指控小米及其旗下印度公司涉嫌违反印度《1999年外汇管理法》向外国实体非法汇款，扣押小米印度公司约7.25亿美元资产。2023年6月，印度负责处置金融犯罪的中央执法局正式通知小米印度公司、部分高管及相关金融机构，其涉嫌向外国实体非法转移资金违法事实成立，当局先前扣押的小米资产将被正式没收。2023年12月，中央执法局又以涉嫌参与洗钱犯罪为由逮捕两名vivo印度公司高管。同年12月30日，德里帕蒂亚拉法院裁定许可对此前被捕的两名vivo高管进行保释，但上述vivo高管刑责尚未洗脱，本轮vivo刑事合规事件的走向仍有待观察。

印度政府运用经济和税务相关刑事规范钳制中资科技企业在印度经营，可从民族情绪表达催化下科技权力博弈和地缘关系演进等维度加以剖析<sup>[37]</sup>。作为前提，研发WeChat、TikTok、小米手机和vivo手机等软硬件产品的腾讯、字节跳动、小米和vivo等中国ICT企业，其应对国际化经营合规挑战的认知准备和知识储备均暴露短板，既体现在对东道国合规审查的司法化及政治化后果的认识不足，亦体现在对东道国针对性规范文件缺乏系统前瞻。

从科技权力博弈看，印度政府对小米和vivo等通讯终端企业的持续稽查，以及对TikTok和WeChat等软件应用产品的全面禁止，分别是算力和算法维度实施科技权力博弈的缩影，其显著地内嵌于东道国决策层民族情绪的表达。科技权力博弈，相当程度上是数据、算法和算力之争。印度握有软件外包产业的先发优势，暂未有效解决数据质量、算法模型和算力设施等数字化转型的关键问题，亦尚未深度发挥融合本土人口红利和数字红利的乘数效应<sup>[38]</sup>；加之本土头部科技企业缺位，打压域外头部企业成为培育本国头部企业、凝聚国内共识的关键策略。

从地缘关系演进看，自西汉张骞通西域以来，经贸交往和地缘冲突已成为中国与南亚次大陆地缘互动的原初范式，该范式在东汉班超出使西域时在与贵霜帝国的复杂博弈中得以巩固<sup>[39]</sup>。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南亚次大陆建立“公司—国家”机制以前<sup>[20]</sup>，印度长期作为区域性文明独立存续<sup>[40]</sup>，虽然深受文明交流的影响，但总体而言，既不归属于西方文明，亦处在东亚朝贡体系的边界之外。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日益稳固之后，印度又被西方世界较早卷入初期全球化探索之中，自彼至今，其社会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日益积累起浓厚的西方色彩，并逐渐成为西方世界维系霸权的地缘支点。因此，虽然印度和中国同为金砖国家，并同处在RCEP框架体系之中，但美国主导的“印太经济框架”等战略的影响不可忽视，加之本土民族情绪催化，当前的中印关系经贸竞合与地缘分歧交叠<sup>[41]</sup>，颇有回归两汉时期互动特征的态势，进而就在印度探索本土化经营的中资科技企业而言，地缘分歧成为无差别钳制上述群体的内在根源。

基于国际治理框架重塑加速和全球主要法域博弈加剧的大背景，印度政府利用法律规范钳制中资科技企业的底层逻辑较为直观<sup>[37]</sup>。相较之下，中资科技企业在印度遭遇合规挑战的逻辑结构与在东南亚遭遇合规挑战的逻辑结构存在明显差异，但其同样具有不可忽视的讨论价值<sup>[25]</sup>。2023年10月，印度尼西亚政府颁布《2023年第31号贸易部长条例（Reg31/2023）》（以下简称《条例》），《条例》禁止将社交媒体当作电子商务交易平台，并要求印度尼西亚本土电商平台为从域外直接购买商品设定100美元的最低价格，导致在该国市场份额快速增长的TikTok公司遭遇合规危机，TikTok应用被迫下架。《条例》既针对TikTok融合社交媒体和跨境电商的商业模式加以限制，又明显抑制TikTok在商品价格上的比较优势。

《条例》的出台可归因于发展红利竞争和民族情绪表达两大因素<sup>[42]</sup>。从发展红利竞争来看，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数十年的高速增长和以科技企业为支点的数字化转型经验，促使印度尼西亚和越南等新兴经济体愈发重视释放其自身人口红利储备和数字红利潜力。但上述法域



本土科技企业发展水平尚不足以充分融合释放其人口红利和数字红利，因而政府将培育本土科技企业和开发数字红利等政策置于优先地位，进而呈现出利用外商投资、培育本土企业与动员民族情绪之间的明显张力，致使兼具外商投资和科技产业属性的中资科技企业备受压力。同时，上述要素间的明显张力，亦呈现出东道国内部不同利益相关者围绕发展议题的不同关切<sup>[43]</sup>，展现出中资科技企业通过策略调整应对冲突的潜在前景。2023年12月初，TikTok通过控股印度尼西亚本土电商企业Tokopedia有效缓解了本轮合规危机，并进一步巩固了其在印度尼西亚的市场份额。TikTok本轮合规危机得到迅速转圜，得益于该企业与印度尼西亚政府、本土企业、学者和官员等关键利益相关者的有效对话协商，堪称本土化经营策略调适的重要范例。相较之下，TikTok运用美国联邦司法途径，对源自美国蒙大拿州州立法的规范钳制加以救济。2023年4月，蒙大拿州众议院通过一项在全州范围内封禁TikTok的法案，并获州长Greg Gianforte签署，该项法案原定于2024年初生效。2023年5月，TikTok就上述法案禁令诉至美国蒙大拿州地区法院，诉请裁定该法案违反美国联邦宪法，同年11月，上述诉讼请求得到蒙大拿州地区法院初步支持，初审法官发布禁令对该州法案进行临时冻结，蒙大拿州案例的走向有待后续观察。

综上所述，源自东道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关键行为体的法律规范钳制主要涵盖立法和司法两个层面，且融合国家战略、价值取向、民族情绪和社会动员等核心要素<sup>[44]</sup>，该维度上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打压呈现以下三个新特征：其一，随着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探索的日趋深入，聚焦中资科技企业的法律规范钳制已从传统西方世界扩展至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一带一路”沿线新兴经济体<sup>[37, 43]</sup>。其二，围绕打压中资科技企业，东道国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本土企业等行为体间往往存在较大张力，但中央政府的决策和司法权力仍然起决定性作用。其三，鉴于特定东道国内不同关键利益相关者诉求可能存在潜在差异，中资科技企业有望利用不同群体间的诉求间隙，运用司法手段和协商策略应对相关挑战。

## （二）政府规制束缚

政府规制束缚主要指中资科技企业所在东道国中央政府及相关行为体，利用行政权力对特定或非特定中资科技企业的常规运转施加负面影响。政府规制束缚层面的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其实质乃是政治风险与法律风险的交叉，其底层逻辑往往内嵌一系列利益集团的复杂互动<sup>[1]</sup>，外观上则以行政命令、立法机关听证和针对性政策出台等形式加以落地。TikTok和WeChat等中资科技企业近年来在欧盟和北美遭遇的现实挑战可视为此类风险的典型例证。

传统西方世界围绕中资科技企业编织的政府规制束缚，可用作观察数字时代大国交锋的关键维度。作为中资科技企业的重要代表，腾讯公司旗下的WeChat和字节跳动公司所投资的TikTok在欧盟和北美频遭政府规制，已然成为一系列利益相关者施加影响的关键载体<sup>[45]</sup>。自2020年以来，仅在几年内就积累近亿美国用户的TikTok公司，开始频遭美国总统、国会和州政府等围绕国家安全、青少年健康保护和消费者隐私保护等议题发起的行政命令及调查。

2020年，美国总统选举前夕，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以威胁国家安全为由签署行政命令，强烈要求TikTok限期向美国本土企业出售其北美业务，呈现国家安全泛化和对华博弈深化两大趋势。此前不久，美国国会众议院通过的《国防授权法案》中包含针对TikTok的限制条款，禁止包括国会议员、政府官员和政府公司雇员等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值得注意的是，限制中资科技企业业务应用，已经成为美国政界跨越党派的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将展现对华博弈立场用以应对国内日益极化的现实。

2021年6月，继任美国总统拜登通过签署新行政命令撤销特朗普任期内对TikTok和WeChat的禁令。但撤销旧禁令并非对中资科技企业全面解绑，新行政命令要求美国商务部对“竞争对手”掌控的软件应用实施更广泛的国家安全审查。2023年3月，欧洲议会和欧盟委员会等欧盟机构分别发布公告，以网络安全为由禁止欧盟雇员在公务手机上安装使用TikTok。欧盟跟进对中资

科技企业的行政规制,既是与其北美盟友在科技竞争立场上的协同,亦是对其在数字规则引领性的展示<sup>[37]</sup>。换言之,短期内打压中资科技企业的基调不会因相应法域执政派别的更迭而发生明显改变,这就迫切需要中资科技企业进一步做好合规准备。

相较于联邦行政机构对中资科技企业的约束,美国国会发起的束缚举措也不遑多让。自2021年以来,TikTok等中资科技企业多次受到美国国会参众两院各委员会发起的听证质询。2021年10月,美国国会参议院“消费者保护、产品安全和数据安全委员会”围绕青少年健康保护召集听证,要求TikTok、Snapchat和YouTube等企业参加质询。出席听证的TikTok高管不仅要回应有关其软件具有误导青少年失范行为潜质的质询,而且需审慎处置参议员Ted Cruz等抛出的“中国威胁论”。2022年10月,美国联邦参议院“国土安全与政府事务委员会”就社交媒体对国土安全影响召开听证会,这是TikTok第二次参加美国国会质询。作为Lincoln Network企业代表的Geoffrey Cain极力夸大TikTok的市场占有率和对美国国土安全产生的现实威胁,并呼吁CFIUS再次对TikTok启动国家安全审查。

除美国总统和国会以外,各州行政机构也深度参与到压制中资科技企业中来。2023年8月,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Jimmy Patronis援引《佛罗里达州宪法》签署行政命令,禁止该州金融服务部门雇员在政府设备上使用TikTok,该州于2023年在全州的公立大学系统封禁TikTok、WeChat和QQ等应用,既禁止在公用设备上登录上述应用,又在校园网络中屏蔽其链接。截至2023年12月,全美已有24个州对TikTok等应用采取了各种限制措施,其中,又以蒙大拿州最为激进。2023年5月,蒙大拿州州长Greg Gianforte签署行政法案,禁止相关商业公司在蒙大拿州提供TikTok下载,该州由此成为全美全面封禁TikTok等中资软件产品的首州。

借用“认知—叙事—策略—实践”的理论框架加以分析,TikTok和WeChat等中资科技企业在公共政策层面遭遇明显阻力可以简化为新一轮全球科技竞赛的关键行为体认知、中国官方利益的代言者叙事、催动行政机能加以遏制的既定策略和打出行政举措组合拳实施围堵实践等四者的集合。从全球科技竞赛的参与主体来看,传统西方世界科技产业发展出现分化割裂态势,金砖国家等新兴经济体的科技企业呈现加速发展趋势。鉴于西方世界继续引领本轮数字产业革命的不确定性日益上升<sup>[46]</sup>,加之新兴经济体借助数字权力重塑全球治理框架的意愿和潜力同步增长,欧盟和北美政府逐渐将域外科技企业定义为关键行为体<sup>[35]</sup>。概言之,传统西方世界的兴起及其先发优势的维系,相当程度上源自其本土企业对蒸汽、电力、计算机和互联网等历次产业革命核心技术的成功转化。相较之下,面对数据积累、算法模型和集成算力硬件等要素的竞逐,传统西方世界并无明显先发优势。虽然欧盟和北美分别在数字规则和数字产业上仍处于领先地位,但欧盟头部科技企业缺失<sup>[47]</sup>、北美数字产业与新兴科技企业相对差距缩小等事实也逐步显现出来。

立足对新兴科技企业在数字产业竞赛中关键行为体的界定,着力刻画头部科技企业与本国政府利益的协同性、一致性,已成为西方世界在话语叙事行动的首要目标。歪曲对中资科技企业及其产品的认知,美国政客表现得尤为明显。美国新任众议院议长Kevin McCarthy公开表态TikTok应用的迅速扩张系中国数字极权主义(Digital Totalitarianism)的表征,其将收集窃取敏感政治信息,并涉嫌“美化”中国形象,故应对该软件加以严格制裁。美国众议院“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Select Committee on Strategic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候任主席Mike Gallagher公开批评TikTok为“数字芬太尼”,不能放任其荼毒美国青少年。此外,Mike Gallagher亦联合民主、共和两党其他议员提出《反中国社交媒体法案》(Anti-Social CCP Act),意在终结字节跳动和TikTok在美运营。该法案得到美国国会较为广泛的响应和支持,折射出西方世界日益极化的现实趋势和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的微妙处境。

基于讨论认知和叙事两大要素,西方催动行政机能遏制中资科技企业的既定策略日趋明晰,突出表现在围绕域外头部科技企业打出政策规范组合拳。从对中资科技企业遏制策略持续性来



看，遏制基调是通过融合意识形态差异、发展模式分歧、对话渠道缺失和社会认知转变等数个关键要素的复杂决策，其形成有赖于特定东道国内主要利益相关者的共识凝聚，短期内较难因政治派别更替而发生实质变化。

从特定东道国中央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机构束缚实践来看，相关举措主要围绕薄弱和新兴两大主体设计，既瞄准中资科技企业欠缺应对经验的青少年健康保护、消费者隐私保护、竞争中立、劳工权益和环境保护等重要议题，与企业社会责任关切高度契合；又向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保护和数据安全等偏重网络空间治理的维度倾斜，展现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深度关联。因此，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支点，回应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挑战，具有重要现实意义，且结合数据合规议题，亦有充分可操作性。

### （三）媒体舆论博弈

媒体舆论博弈主要用以描述西方世界特定利益集团为维系本土科技产业优势、头部科技企业竞争优势，对探索融入东道国市场的新兴经济体科技企业进行负面评价，在国家安全、消费者隐私保护等议题上利用社会极化趋势、挑动公众负面情绪。青少年健康保护、消费者隐私保护、数据安全合规、竞争中立和底线合规等典型企业社会责任议题，在媒体舆论博弈中居于核心地位。概言之，部分西方头部科技企业、金融机构和政党团体等行为主体，人为制造或推波助澜夸大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探索中的合规风险与瑕疵，借此保障其在产业博弈和商业竞争中的先发优势。西方主要经济体意图维系本土科技产业优势，需从数字经济浪潮下国际经济秩序变革与域内发展模式转型交叠的大背景加以考察<sup>[4]</sup>。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技术要素不仅为历次产业革命提供关键动力，而且显著影响全球治理框架和国内发展模式的演进。在此过程中，跨国公司兼具全球治理行为体和客体的双重定位。进而头部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日益深刻地影响其本土科技企业生存与发展。鉴于作为公法主体的政府和作为私法主体的科技企业均致力于推进数字化转型，新一轮全球科技产业之争可以简化为数据博弈、算法竞赛和算力比拼的集合。

认知上，传统西方世界将中资科技企业视为对本土科技产业发展的重大挑战，将华为、小米、大疆、TikTok和WeChat等企业的域外探索视为肘腋之患，亦将处置国际化经营的域外科技企业看作调和本土不同利益集团关切的筹码，促使关键利益相关者普遍认同需采用公法手段因应私法主体。叙事上，西方世界则着重传递两方面的信号：其一，引导社会公众质疑经济全球化的价值，塑造新兴经济体及其跨国公司单纯受益而不充分履责的形象。其二，试图借助界定“数据主权”等概念的契机，维系其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引领国际治理规则的话语权<sup>[31]</sup>。西方主流媒体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评价，构成社会公众质疑全球化意义的关键成因。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则成为西方媒体叙事中全球化的最大受益方，进一步固化了日益极化的西方世界对新兴经济体及其本土跨国公司的刻板印象。同时，西方媒体将域外科技企业刻画为支撑新兴经济体攫取数据权利的主力，渲染域外科技企业横跨传统物理边界和新兴网络空间的数字威胁。

基于上述逻辑，TikTok、WeChat、华为和小米等新兴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成为西方世界发动媒体舆论博弈的主要群体之一，遭遇东道国政府、头部科技企业和媒体机构等关键行为体的挑战。基于“认知—叙事—策略—实践”的分析框架，东道国行政组织、司法机关和立法机构等政府职能分支、头部科技企业和主流媒体机构，围绕因应域外新兴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形成复杂互动机制。其中，应对科技跨国公司这类私法主体的制度性举措，仍主要以东道国政府这一典型公法主体的行政命令和立法规范等形式落地；东道国头部科技企业不仅能形塑特定法域的公共政策制定和立法过程，而且通常能依托产业布局对主流媒体机构施加重要影响。同时，政府部门仍对科技和传媒等商事主体保有显著掌控力，展现出上述复杂互动机制的另一重面向。

以美国头部科技企业为例，由于政府部门公共产品供给能力难以迅速匹配数字网络空间持续扩张催生的新治理需求，微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私法主体实质上在数据积累、算法规

制和算力建设等关键维度供给准公共产品，并成为电子通信、物流运输、供应链运营、软件系统开发和硬件制造等重要应用场景的商事主体支撑<sup>[13]</sup>。头部科技企业日益增长的公共产品供给潜力和社会应用场景支撑能力，促使其在既有社会治理框架下的议程设置能力持续提升，从而得以通过影响政府机构、非政府组织和当地社区等关键利益相关者来形塑政策制定和立法过程，Facebook公司卷入的“剑桥分析”事件可被视为头部科技企业影响公共决策的典型例证。然而，“棱镜门”事件中美国联邦情报部门对微软、谷歌、苹果和Facebook等科技巨头服务器数据的挖掘，揭示了东道国政府机构与本土头部科技企业间的双向复杂互动<sup>[48]</sup>。此外，鉴于数字时代头部科技企业的商业模式本身与流量、广告和媒体紧密联系，上述头部科技企业往往通过资本和产业布局显著影响媒体机构行为逻辑，谷歌的搜索引擎和流媒体业务、Facebook的社交媒体和即时通信业务、亚马逊的广告和订阅服务等业态本身具有媒体性质，头部科技企业又能依托其巨大体量影响传统传媒机构潜在运营趋势。同时，传统主流媒体仍保有利用舆情影响头部科技企业的显著潜力。美国《华盛顿邮报》于2023年刊载长文揭露Meta（原Facebook）雇佣公司攻击TikTok，可为上述头部科技企业与主流媒体间的复杂互动提供典型例证。

一言以蔽之，东道国政府机构等公法主体和东道国头部科技企业等私法主体，对华为、TikTok、WeChat、Temu和希音（SHEIN）等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实施媒体舆论博弈，分别致力于维系特定法域在科技产业上的先发优势、保持特定企业的体量和议程设置能力。在某一法域内，政府机构、头部科技企业和主流媒体等主体之间呈现复杂互动态势，乃至东道国司法机关和主流媒体的行为结果可能对中资科技企业本土化经营产生积极影响<sup>[1]</sup>。除借助东道国司法途径和主流媒体正向反馈之外，中资科技企业主动迎击媒体舆论博弈的积极意义愈发凸显。TikTok于2023年3月委派CEO周受资出席美国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召开的听证会，堪称海外中资科技企业媒体舆论博弈策略转型的范例。虽然TikTok公司高管与美国立法机构代表围绕用户隐私、数据安全合规和青少年健康保护等议题展开坦诚深入交流，其形式意义明显大于实质，但面向日趋极化的西方世界塑造负责任的企业形象，为改变关键群体刻板印象塑造可能性，相比游说探索和民间对话更进一步，无疑具有里程碑意义。

#### 四、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应对的体系化构想

虽然中资科技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探索取得了较为显著的效果，但也必须正视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中的合规风险谱系。华为和中兴等遭受西方世界持续制裁、小米遭遇印度等国巨额涉税处罚和TikTok北美业务备受钳制等事件无疑是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典型例证。由于国际治理秩序重构与全球主要经济体变革转型相互纠缠，结合各国面对国家安全保障、发展模式转型和社会公众情绪表达等关键议题的认知、叙事、规范和实践，中资科技企业应对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谱系应以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为逻辑起点，融合法域博弈、央地互动和企业竞争等多重维度构建合规风险防范体系。多元国情、多项议题和多重维度，决定处理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难以毕其功于一役，而宜以企业社会责任为支点提供议程基础和行动路径，以体系化方案取代国际化经营的中资科技企业各自为战、零打碎敲，久久为功，渐进式审慎融贯而非被动受制于西方规则框架和话语叙事，小步快走式完善中国涉外法治体系。

##### （一）系统集成多梯次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体系，纾解企业国际化经营突出难题

倘若沿着“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基于涉外法治队伍尚且难以配置到位，无疑将导致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体系建设沦为空谈。鉴于21世纪以来科技企业领衔中的企业海外布局持续加速，其对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的需求日益增加。截至2022年末，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已达2.75万亿美元，且中国境内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对外直接投资企业已逾4.50万家，巨大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使得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人才供给短缺更加凸

显<sup>[49]</sup>。高端涉外法治人才培养与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之间存在显著内生性联系，集中体现在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体系复杂性与适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系统性的耦合上。

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体系复杂性，既体现在遵守法律规范、符合产业标准和履行社会责任等多个层级，又与数据安全、出口管制、经济制裁、环境保护、劳工权利、税务征收、竞争中立和风俗习惯等关键议题密切联系。其本质在于通过对硬法规范、软法规则和技术标准的全生命周期跟进应对以保障企业海外经营效益，即前置性识别、预防规范和降低相关风险<sup>[5]</sup> 41-45。系统培养适格涉外法治人才主要体现在需求要素多元与目标实施期望面临严峻挑战的内生性张力上<sup>[4]</sup>。从需求要素多元来看，适格涉外法治人才应厚植家国情怀、通晓国际规则、身负外语素能、熟悉本土情境、精通国别知识、熟稔产业前沿<sup>[49]</sup>，从而导致高质量涉外法治人才供给在时长和规模上明显承压。从目标实施期望看，适格涉外法治人才需能在一系列特定应用场景下融贯本国主张和东道国规范要求，催生集成本国法律审慎制定与实施和目标法域政策规范准确认知和运用的双重挑战。基于上述逻辑，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队伍建设构成涉外法治人才培养谱系的关键环节，涉外法治人才类型化培育为企业域外经营合规知识供给奠定坚实基础。以支撑中资科技企业有效应对域外经营风险谱系为逻辑起点，适格涉外法治人才培养应从基干人才选拔策略、基础素能配置方案和国际组织话语权提升等方面发力。在基干人才选拔策略上，宜推进搭建基础教育、高等院校与实务机构间的长期协同机制。

同时，鼓励区域内具有不同学科优势的高等院校搭建协作育人平台，并推进高校与国内外国际组织、法律服务机构和纠纷解决机构的常态化合作，以此着重强化适格涉外人才法治实践素能。此外，多渠道推进海外企业一线员工涉外法治素能提升。在国际化经营合规基础素能配置方案上，宜按照东道国规范标准、外语能力和国际规则并重、东道国风俗习惯和本国情境次之、地缘政治和产业知识列为重要单项的框架加以配置。在国际组织话语权积累上，宜采取长期主义进路，聚焦基础职级国际公务员的全生命周期培养，除高等院校国际公务员候选人培育之外，探索从具备国际化经营风险应对经验的海外企业雇员中遴选国际组织雇员候选人，以此逐步提升中国在国际组织任职雇员比重，从而渐进式提升中国企业在现有国际治理框架下的话语权。

## （二）充分发挥区域制度安排对话功能，求解各方共识最大公约数

应接受经济全球化已在相当程度上受挫的现实，逆全球化趋势可以从美国决策层调整对华策略、公众情绪促使英国脱欧等转向中略见一斑。同时，全球经济的良性发展有赖于各主要法域协作供给稳定的政治基础<sup>[50]</sup> 2-3，且区域主义所支撑的区域经贸投资制度框架不应成为逆全球化的加速器，而应视作围绕布雷顿森林体系遗产温和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压舱石。进而，“印太经济框架”与“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碰撞不应滑向“修昔底德陷阱”逻辑下的零和博弈<sup>[36]</sup>，而宜以承认中美等大国因发展模式差异所催生的分歧为前提，通过中国深入引领RCEP、尝试参与DEPA和CPTPP、探索推进中美BIT等途径重拾中美在国际经济秩序治理中的信心和凝聚共识<sup>[25]</sup>。一方面，认可国外经贸投资挑战对倒逼国内发展模式转型的潜在积极意义。以中美为推动解决“中概股危机”而初步达成的接受PACOB在港查阅在美上市中概股公司审计底稿的安排为例，对数百家中概股企业遭遇退市危机的来龙去脉抽丝剥茧，固然需要给出充分保障跨境数据安全的底稿查阅操作方案<sup>[51]</sup>，也应客观评估美国证券监管对倒逼中国企业提升公司治理和可信审计的激励效果，并以超越“中概股危机”的思维审慎区分其中的民族主义情绪表达和现实问题解决方案供给。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间通过深化协作而产生的指数性增长影响力。审慎将“查戈斯群岛咨询意见案”等关键事件的深刻影响用作逻辑起点<sup>[52]</sup>，以提升经济协作互惠效益为切入点，向东盟、欧佩克、上海合作组织等行为体经济痛点倾斜，增强与上述区域组织间以多边主义重塑国际经济秩序的共识基础<sup>[25]</sup>。



### (三) 类型化归纳不同群体核心诉求, 差异化处理分领域实践分歧

使得应对“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际化经营实践挑战颇为棘手的诱因在于沿线法域国情多样、牵涉利益相关者众多、利益诉求多元。就沿线法域国情而言, 既有印度、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 也有缅甸、柬埔寨等欠发达国家, 又有伊朗、土耳其等关键地缘国家, 造成各国对安全和发展需求存在显著差异。就涉及利益相关者而言, 则有中央政府、地方政权、非政府组织、本地社区、外国企业、宗教团体、在野政党和媒体机构等主体。同时, 利益集团的概念框架可用以类型化归纳具有多元利益诉求的相关主体, 应正确定位利益集团概念的价值中立性质, 建立分别以分歧领域和主体类别为横纵坐标的分析矩阵。

应系统考察“认知—叙事—策略—实践”分析框架下特定利益集团涉及某一领域议题的言与行, 区分相应主体在安全、发展和民族主义情绪压力下的策略性回应和价值性选择, 不宜代之以一刀切的反制。以中国电力投资集团投资密松水电站项目受挫为例, 缅甸中央政府叫停密松水电站项目的主要动机, 源自在区域大国间获取更大的斡旋空间和推进军政府政权合法性来源的转型<sup>[53]</sup>; Facebook 和 News Corp 等跨国公司则通过旗下媒体带动不利于密松水电站项目的舆论导向, 从而通过支持母国政府对华竞争获得更大的议价能力; 外国在缅甸非政府组织则利用环保和宗教议题煽动对立情绪, 以达到幕后资助者预期的舆论效果; 日本和印度等海外企业则期望从密松水电站项目停摆中收获渔翁之利。因此, 存在对该国政府、区域大国企业等利益集团争取合作和回旋的可能性, 对持有明显政治价值诉求的西方跨国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则需加以警惕并系统反制。

### (四) 全生命周期追踪东道国规范政策演进, 构建事前防范的合规体系

中美博弈走向深水区, 国际经济秩序重构加速, 法律规则日益成为美国政府和立法机构与国内一系列利益集团复杂互动结果的固化呈现, 并成为博弈的手段, 促使“一带一路”沿线投资实践挑战日益以法律的外观加以呈现。一方面, 突出体现在美国国内法的长臂管辖效力持续强化上, 如《反海外腐败法》《明确境外数据的合法使用法》等的域外影响足以改变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的投资图景。例如, 美国政府新近通过《芯片和科学法案》, 该法案试图向美国国内芯片产业链上相关企业提供高额补贴, 结合 Chip 4 倡议尝试通过拉拢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重新主导芯片产业链, 进而促使芯片制造产能回流美国, 同时围剿中国芯片制造产业。该法案目标一旦达成, 势必扰乱东亚和东南亚芯片产业格局, 从而实质搅扰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另一方面, 与中国制造摩擦对立、对中国企业实施制裁的做法日益向“一带一路”合作伙伴传导, 成为其保护本国产业发展、调节国内分歧、凝聚国内共识的关键策略。以小米公司遭遇印度税务执法机构巨额处罚为例, 该事件揭示“一带一路”沿线投资环境日益复杂的趋向, 印度政府在大国博弈、发展转型和民族情绪宣泄的多要素影响下, 对中国在印度投资频繁施加制裁<sup>[37]</sup>。进一步来讲, 该事件暴露了中国企业海外法律合规中的明显短板, 处在中资科技企业头部位置的小米尚且缺乏对印度税务合规风险的系统把控, 更遑论合规体系亟待完善的其他海外企业。因此, 风险预警前移构成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关键步骤, 既要系统梳理和掌握东道国法律框架, 又要审慎构建事前防范导向的合规体系。一方面, 鉴于立法系政府决策者与一系列利益集团复杂互动的结果呈现, 立法过程可能极为耗时, 而在立法正式推出后筹谋应对策略往往措手不及、效果不彰。因此, 需要围绕立法目的对特定立法加以事先关注和过程评估。另一方面, 事先合规体系的构建并非简单地相关域外规则一概列为合同条款, 这种僵化策略不仅极易助长特定国家法律条文域外效力, 且其实际合规效果往往付之阙如。从这个意义上讲, 风险预警前移是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关键路径, 需要在条文免责外观与实际合规效果间审慎衡量, 并在环境、劳工保护、知识产权和税务等具体领域做到有备而来。

### (五) 重视多媒体舆情归集和分析, 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话语本土化表达

计算机和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和迭代, 拓展了制造和应对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

场域维度,数据跨境流动促使大国间的媒体舆论博弈对地缘物理空间的依赖日益减少,传统媒体与社交新媒体的融合应用迅速成熟,媒体舆情博弈平台功能日趋显现<sup>[54]</sup>,各类行为主体在特定东道国制造投资挑战的手段进一步丰富。以行为主体类别来划分,与媒体舆情有关的挑战主要有三类:其一,西方情报机构为影响大国博弈而进行的信息投放,数据跨境流动本质是双向过程,不仅包括以“棱镜门”为代表的监听和窃取,而且包括情报机构主导的信息投放,期望以此影响特定群体关键决策<sup>[50] 714-715</sup>。其二,西方头部科技企业试图通过展现政治立场攫取商业利益,放任或支持其旗下媒体业务传播曲解中国国际化经营目的和行动的新闻舆情<sup>[54]</sup>。其三,接受域内外利益集团资助、影响东道国本土媒体围绕环境、民族、宗教等议题制造、传播舆情。

使用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体系,既能因相应话语概念源自西方世界而被深入理解和形成对话,环境保护、劳工保障和人权保护等社会责任关键议题本身又受到东道国利益相关者关注,以社会责任为支点客观描述传播中国企业国际化经营实践,因而构成破解媒体舆论层面企业国际化经营挑战的现实路径<sup>[24]</sup>。增强社会责任话语的国际化叙事和本土化表达,厘清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国际化叙事应是传播渠道与叙事内容的有机结合,西方世界惯常使用的传统媒体渠道和新媒体渠道值得深入探索评估,对事实真相正本清源极为关键,但不宜完全采用针尖对麦芒的争论式辩白,而应辅之以柔克刚的策略展现中资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理念。

#### 参考文献:

- [1] CHEN T. Digital wild west: foreign social media bans, data privacy, and free speech[J]. *Hastings communication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2022, 44(2): 163-194.
- [2] ZHANG A H. Agility over stability: China's great reversal in regulating the platform economy[J]. *Harvard international law journal*, 2022, 63(2): 457-514.
- [3] CHANDER A. Trump v. TikTok[J]. *Vanderbilt journal of transnational law*, 2022, 5(5): 1145-1176.
- [4] 黄惠康.从战略高度和全球视角认知和推进涉外法治建设[J]. *法治现代化研究*, 2022(5): 37-54.
- [5] 杨力,卞传山.商业合规的微观理论研究[M].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2022.
- [6] 杜涛.对外关系法的中国范式及其理论展开[J]. *云南社会科学*, 2022(4): 131-141.
- [7] 尹云霞,李晓霞.中国企业合规的动力及实现路径[J]. *中国法律评论*, 2020(3): 159-166.
- [8] 杨力.中国企业合规的风险点、变化曲线与挑战应对[J]. *政法论丛*, 2017(2): 3-16.
- [9] 沈岿.软硬法混合治理的规范化进路[J]. *法学*, 2021(3): 69-83.
- [10] 沈伟,靳思远.网络空间博弈时代跨国科技企业面临的公私矛盾及应对——以抖音(TikTok)为例[J]. *国外社会科学*, 2022(5): 72-90+196.
- [11] 吴尚轩.公司治理的中国话语体系构造研究[J]. *财经问题研究*, 2023(1): 73-84.
- [12] DIJCK J V. Governing digital societies: private platforms, public values[J]. *Computer law & security review*, 2020, 36(4): 105377.
- [13] KHAN L M. Amazon's antitrust paradox[J]. *Yale law journal*, 2016, 126(3): 710-805.
- [14] ERIE M S, STREINZ T. The Beijing effect: China's digital silk road as transnational data governance[J]. *New York university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 policy*, 2021, 54(1): 1-92.
- [15] CHEFFINS B. Stop blaming Friedman[J]. *Washington university law review*, 2021, 98(6): 1607-1644.
- [16] 约翰·鲁格.正义商业:跨国企业的全球化经营与人权[M].刘力伟,孙捷,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 [17] 杨力.企业社会责任的制度化[J]. *法学研究*, 2014(5): 131-158.
- [18] 华忆昕.印度强制性企业社会责任立法的中国启示[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8(3): 97-105.
- [19] 卡尔·波兰尼.巨变:当代政治与经济的起源[M].黄树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9-33.
- [20] PHILLIPS A, SHARMAN J C. Company-states and the creation of the global international system[J].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020, 26(4): 1249-1272.

- [21] HANSMANN H, PARGENDLER M. The evolution of shareholder voting rights: separation of ownership and consumption[J]. Yale law journal, 2014, 123(4): 100-165.
- [22] 兰德尔·K.莫克.公司治理的历史:从家族企业集团到职业经理人[M].许俊哲,译.上海:格致出版社,2022:82-84.
- [23] 陈拯.无问西东:古代东亚秩序研究的自我束缚与解脱[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20, 37(6): 130-154.
- [24] 沈骑,刘思琪.中国ESG话语能力建设的基本问题与研究路径[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2(5): 54-66.
- [25] 彭德雷.涉外法治视野下“一带一路”国际规则的建构[J].东方法学, 2023(5): 16-27.
- [26] 王丽娜.多利益相关者、权力博弈与中国—东南亚基础设施合作的有效性[J].当代亚太, 2023(1): 125-156+160.
- [27] 邢瑞利.美国“印太经济框架”对中国—东盟关系的影响及应对[J].和平与发展, 2023(6): 105-133+158.
- [28] 陈曙光.政治话语的西方霸权:生成与解构[J].政治学研究, 2020(6): 37-45+126.
- [29] 刘德斌.世界的重塑:从“帝国”到“民族国家”[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 2019, 36(6): 11-24.
- [30] 郭春镇.生成式AI的融贯性法律治理——以生成式预训练模型(GPT)为例[J].现代法学, 2023, 45(3): 88-107.
- [31] DASKAL J. Borders and bits[J]. Vanderbilt law review, 2018, 71(1): 179-240.
- [32] 莱纳·克拉坎曼, 保罗·戴维斯, 亨利·汉斯曼, 等.公司法剖析:比较与功能的视角[M].刘俊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5-42.
- [33] SWAN M. Blockchain: blueprint for a new economy[M]. Sebastopol: O'Reilly Media, Inc. 2015: 1-7.
- [34]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 2-11.
- [35] SEGAL A. When China rules the web: technology in service of the state[J]. Foreign affairs, 2018, 97(5): 10-18.
- [36] 袁志刚.当前经济全球化的深层矛盾和基本走势——从零和博弈到正和博弈:一个政治经济学的新视角[J].探索与争鸣, 2020(7): 50-58+158.
- [37] 王春燕.印度在美国供应链重塑中的定位、行动及对中国的影响[J].南亚研究季刊, 2023(4): 1-20.
- [38] KHADRIA B, MISHRA R. Techn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n India: the debate between appropriate and frontier technologies [C]// Handbook of innovation & appropriate technologies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22: 71-85.
- [39] 杨巨平.两汉中印关系考——兼论丝路南道的开通[J].西域研究, 2013(4): 1-12+137.
- [40] 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5版.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5: 3-5.
- [41] 吴琳.大国身份叙事重塑与印度的新“全球南方”外交[J].太平洋学报, 2023, 31(11): 1-15.
- [42] 高鹏.印尼现代国家的建构——以央地关系、族群、宗教三位一体关系为视角的考察[J].社会科学, 2022(2): 50-59.
- [43] 包广将,林晓丰.地位焦虑:印尼应对中美战略竞争的逻辑[J].南洋问题研究, 2022(3): 112-129.
- [44] 邢瑞利.东盟国家对“印太经济框架”的认知与反应——基于经济预期与威胁认知的解释[J].东南亚研究, 2023(1): 42-61+155-156.
- [45] REMBERT R L. TikTok, WeChat, and national security: toward a U.S. data privacy framework[J]. Oklahoma law review, 2022, 4(3): 463-502.
- [46] ROTENBERG M. Schrems II, from Snowden to China: toward a new alignment on transatlantic data protection[J]. European law journal, 2020, 26(1-2): 141-152.
- [47] LIU J. China's data localization[J]. Chinese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020, 13(1): 84-103.
- [48] CHANDER A, LE U P. Data nationalism[J]. Emory law journal, 2015, 64(3): 677-739.
- [49] 刘志云,谢春旭.“一带一路”倡议与涉外行业规范体系的完善[J].武大国际法评论, 2023(6): 42-59.
- [50] 罗伯特·吉尔平.全球资本主义的挑战:21世纪的世界经济[M].杨炯,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1.
- [51] HUANG R H. The US-China audit oversight dispute: causes, solutions, and implications for Hong Kong [J]. International lawyer, 2021, 54(1): 151-199.
- [52] 黄惠康.国际法的发展动态及值得关注的前沿问题[J].国际法研究, 2019(1): 3-14.
- [53] 张添.默许程度与生存空间:缅甸军人政权的国际合法性分析[J].南洋问题研究, 2023(4): 53-70.
- [54] RUSTAD M L, LIU W, KOENIG T H. Destined to collide? Social media contracts in the US and China [J].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015, 37(2): 647-739.



## The Systematic Containment of the Compliance Risks of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WU Shang-xua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Law,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Summary:** In the newest round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 batch of Chinese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breakthrough in fields including big data, chips manufacturing, recommendation algorithms, and transborder E-commerce has incurred both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straints from a series of key stakeholders. These stakeholders cover the host country's decision-making and legislation group, leading technological corporations, media organisations and so on. The harsh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hallenges encountered by representative Chinese enterprises (such as Huawei, WeChat, Xiaomi and TikTok) can be typical illustration of the misunderstanding and constraints discussed above.

This article's principal innovation lies in using th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CSR) theory to build its analytical framework and focusing on the analyses of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practical challenges. Thus, under the entanglement of the international order reconstruction and the domestic development transformation, this article intends to portray an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ompliance risk spectrum and classify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hallenges into legal norm suppressions, administrative regulation constraints and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games respectively within the spectrum. Furthermore, in comparison to existing literature, this article mainly proposes solutions in terms of both epistemology and methodology. In the dimension of epistemology, this article emphasises the importance of rebuilding China-Western dialogue mechanisms and accumulating consensuses. Also, this article denies the possibility of solving once for all. Considering tha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has become a mainstream field of the super-power game, to systematically cope with the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ompliance challenges consists of a batch of key steps including cognition, narrative, norm formulation and strategy implementation. Thus, since it involves plenty of dimensions and a series of vital elements, to handle the challenges above should harness a progressive comprehensive scheme rather than accomplish the whole task at one stroke.

As the CSR serves both a core element of the commercial compliance practice and a hinge point for these key steps mentioned above including cognition, narrative and norm formulation, it is therefore able to provide a solid foundation for promoting the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risks containment. For the sake of alleviating the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hallenges efficiently and pertinently, several key approaches should be conducted concurrently. First, to differentially cultivate the foreign-related legal talents shall function as a vital basis. Meanwhile, it is crucial to fix and rebuild the regional dialogue and negotiation mechanisms. Following this logic, it is wise to differentially cope with these interest parties' diversified core appeals. Besides, it is also necessary to track the full life circle of the norm and policy formulation of a specific host jurisdiction and harness the media and public opinion analyses.

**Key words:** technological enterprises' international operation; commercial compliance; corporate social responsibility; foreign-related rule of law; media opinion

(责任编辑: 刘 艳)

[DOI]10.19654/j.cnki.cjwtyj.2024.03.008

[引用格式]吴尚轩. 科技企业国际化经营合规风险的体系化防范[J]. 财经问题研究, 2024(3):94-108.